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

□ 魏继昆 王泽人

破立并举是我们党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和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批判旧有的思想观念以及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推进理论创新，破立并举，建立了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破主观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

就党的建设而言，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在党的历史上，破除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主观主义危害，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延安时期，尤其是从1942年全党整风以后，学风问题更是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议题。历史告诉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段时间，党内主观主义盛行，更是“是害死人的”。对此，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后学风问题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对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学风予以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1942年4月，在《关于整顿三风》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党“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正是通过全党整风，在党内逐渐克服了主观主义的危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建设一个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在1945年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建设时，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列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破宗派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党风

宗派主义如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不团结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上的一种表现。在1942年全党整风之前，它在党内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残余形态的宗派主义，还是长期存在的。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其危害也是很严重的。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在总结过去20年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后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对其严重危害，1942年7月，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报告》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而宗派主义是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更是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绊脚石，必须坚决予以清除。有鉴于此，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以及在构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将宗派主义列为重要的整顿对象之一；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一样，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实践证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全党整风以深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风建设达

到了新高度。这样，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现了新突破并迈出了关键步伐。

破党八股的形式主义之危害，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文风

文风一般认为是指文字之风、文艺之风、文化之风的形式问题。实际上文风从来就不是一股单独之风。其背后是党风、政风、民风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之风，也是时代之风。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过程中，党内文风始终是与学风和党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通过全党整风而深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不仅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而且强调“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因为党八股是党内存在的以形式主义为主体的恶劣文风，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最后藏身之所”，也是推进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所必须破的消极因素。对此，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作了专门剖析和批判，并指出党八股“不但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将其列为全党整风的主要对象之一。事实上，文风问题不是一般问题，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在破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同时，也着力破除党八股这一恶劣文风的危害及其影响。尤其是毛泽东发表的《反对党八股》被列为全党整风的重要文献，其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通过延安整风，党八股逐渐被消除，党内迎来了一个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破贪污腐化之危害，立清正廉洁政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了集中体现共产党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延安精神。当时，我们党既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面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复杂局面，还面临党的队伍迅速发展而带来的自身建设问题，再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我们党不惧挑战，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此过程中，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局部执政本领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勇于清除贪污腐化，建设一个影响深远而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这一重要举措的实行，不仅影响了党内和国内，而且越出了国门，影响了世界。在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美国记者斯诺就盛赞延安的中共领袖理想远大而清正廉洁。针对当时根据地存在的个别贪污腐败现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勇于开展自我革命，着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弊端，强化铸牢清正廉洁的意识。比如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郑重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而后又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以及加强党员干部廉洁纪律建设的规定等，都把“惩贪建廉”作为重要内容予以贯彻执行。因而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尤其是在党内形成了“奖励廉洁，禁绝贪污”的良好政治生态。据此，1940年2月毛泽东称这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等“十个没有”。正因这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尤其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更彰显出清正廉洁的一代新风，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湘潭烈士陵园位于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陵园路30号，占地约28亩，201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陵园中轴线上矗立着湘潭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坐西朝东，由碑座、碑身组成，碑高19.49米。碑后是长27.5米、宽1.5米的英烈墙，墙上镌刻着登记在册的1980名为国捐躯的湘潭英雄儿女姓名。碑身正面镶嵌着毛体黑底金字“湘潭烈士纪念碑”。碑座刻有《湘潭市烈士陵园碑记》，全文如下：

湘潭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百余年来，湘潭人民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的英雄事迹，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的教育，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原“烈士墓”改建为“湘潭市烈士陵园”，并树碑辟馆，供人们瞻仰。

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但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崇高的思想情操，是共产主义的教科书。它曾激励过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去夺取胜利，也必将鼓舞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来实现他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

中共湘潭市委
湘潭市人民政府
提质改造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碑文简洁地介绍了湘潭英雄儿女创造的光辉历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无限的缅怀之情。敬读碑文，不禁思绪万千，深受教育鼓舞。

1905年，湘潭县城城区被辟为帝国主义的“寄港地”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直接进入湘潭，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潭青年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新民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地方组织，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些组织的引领下，湘潭的先进青年奔走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1923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对工人运动实施镇压，新民学会会员陈子博决心为民除害，于是他身藏两枚炸弹，向敌人的车子投去，但仓促中未击中。赵恒惕下令全城搜捕，陈子博藏入民宅粪池内躲了3天，最终因中毒不幸于1924年1月逝世。毛泽东亲临追悼会并致哀，挥笔写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挽联，以悼念这位才华横溢、斗志坚强的共产党员。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中共湘潭地方组织迅速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积极推进国共合作，推动和领导湘潭人民“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赵恒惕疯狂屠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湖南农民运动领袖汪先宗组织农会，公开号召农民驱逐赵恒惕，最终因敌人诬陷被捕，于1926年2月被害，成为湖南第一个牺牲的农民运动领袖。1927年马日事变后，湘潭农民揭竿而起，踊跃参加工农义勇军，发动湘潭起义。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反动派用各种手段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瞬间笼罩着湘潭。短短20多天里，湘乡被杀戮的人数达300余人，工农革命组织全被打散。9月，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军参谋长兼

『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湖南湘潭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赵旭 吴宇航

一支队队长庞叔侃受湘潭党组织派遣去安源途中不幸被捕，于10月27日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湘潭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下。但是，湘潭儿女没有屈服，积极配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发动年关暴动除“三害”、开展“护校”斗争等，发扬“有为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继续革命。1928年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参加湘南起义，起义失败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5月，她在作战中负伤被捕，次年8月20日英勇牺牲。毛泽建在遗书中写道：“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

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从此，日本帝国主义经常派出飞机对湘潭进行狂轰滥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湘潭人民纷纷抗日。惠景医院举办救护训练班，为抗战前线培养救护人员；湘潭县立中学的学生发起收集破铜烂铁的活动，提供作为制造军械的原材料；妇女师进会组织妇女上街征集衣物支援前线；商界人士主动封存日货。1944年6月，湘潭县、湘乡县相继沦陷。中共地方党组织迅速安排中共党员掌握部分基层政权，与日伪政权抗争。湘潭县工委积极争取和领导了两支抗日游击队；湘潭群众积极为抗日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参加破路、拆桥等活动，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湘乡县共有57505人服兵役，有5349人在前方阵亡，2042人在战争中负伤。由于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湘潭沦陷的日子里，广大农村仍掌握在人民手里，达到了抗日保乡的目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内战，企图恢复独裁统治。中共湘潭地方党组织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积极开辟城乡工作据点，建立群众工作基础。在城市，发动学生、工人和各界人士开展“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在农村，发动农民开展“三抗”斗争和农村游击武装斗争。从“银城起义”开始，湘潭党组织领导的队伍采取游击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敌周旋达半年之久，产生了如胡佑生、张鹏飞、谭荣华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正是在这些英雄儿女的浴血奋战下，1949年8月9日，湘潭终于获得和平解放。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上接1版）

提升改革能力,加快产业转型

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不断提升改革攻坚能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科技创新促产业转型。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围绕“14+1”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激励政策，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以应用为导向的创新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带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建立重点产业急需攻关技术常态化征集和动态调整的重大议题凝练机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挥体系、责任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政策配套体系，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一批保障产业发展的底层技术，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催生更多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以数智赋能促产业转型。主动跟进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健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措施，加快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打通庆阳、兰州与东部地区国家枢纽节点间的高速直连网络通道，培育算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健全工业互联网平台培优机制，建设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促进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实施“智改数转网联”，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

以招商引资促产业转型。坚持以招商引资产促产业转型，健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措施，加快打造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打通庆阳、兰州与东部地区国家枢纽节点间的高速直连网络通道，培育算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健全工业互联网平台培优机制，建设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促进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实施“智改数转网联”，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

口岸、铁路口岸等开放平台能级，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智能化，完善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机制，打造国际货运班列集散分拨中心，创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运营机制，进一步畅通物流链、优化供应链、壮大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加力推进“一体化”。健全内外贸一体化政策体系，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积极培育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等新业态，探索构建“跨境电商+产业带”等新模式。完善外贸主体培育政策，大力引进外贸企业，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扩大新能源装备、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出口，加大能源资源矿产品、粮油、先进技术设备等进口，带动优势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健全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重大节会促进对外合作机制，完善文化旅游、生物医药、先进技术等领域服务贸易支持政策，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

彰显改革担当,树牢正确政绩观

为政之道，首在政绩观。要以舍我其谁、不负人民的改革担当，自觉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效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

树牢正确的权力观。树牢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坚持人民至上，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坚持教育为主、预防为先，建立政绩观常态化教育制度，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完善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集体决策、重要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全方位扎牢制度笼子，用制度规范、约束、监督、制衡权力，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树牢正确的事业观。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不仅是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干事创业的先决条件。要健全抓学习促提

变成能量、把资源变成资本、把资本变成产业。健全招商引资考核督查机制，把考核成效与评先评优、干部使用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部在招商引资主战场建功立业。

以优化营商环境促产业转型。锚定“西部领先、全国靠前”目标，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年”行动，研究出台《甘肃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培育一批营商环境创新引领示范区，推动全省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良好条件。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统揽，完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机制，落实落细“包抓联”“六必访”等服务企业制度，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性。坚持把重点领域严格监管和包容审慎监管统一起来，推行柔性监管和柔性执法，避免多头多频次执法，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推进“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一张网”改革，促进经营主体公平良性竞争。

拓宽改革视野,加大开放力度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在稳增长、促发展的赛道上，要以登高望远、胸怀全局的改革视野，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

加力融入“双循环”。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切实把“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成效。主动服务和对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用好东西部协作和省际合作等工作机制，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对接合作。支持省属国有企业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合理布局产业链，支持民营企业加快开拓境外多元市场，提升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完善国际产能合作机制，着力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加力打造“大通道”。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好用好陆上通道、繁荣空中通道、畅联网上通道，不断强化甘肃在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通道地位。提升综合保税区、航空